

京华风物

夏梦悠然枕荷芳

漫漫盛夏,暑热炎炎。老人们都说,过去的夏天可没有如今这样热。冰心在小说《奇异的梦》,描写午睡的片断是那么清凉宜人:“那是一天下午,我躺在床上。窗帘垂着,廊下的苇帘也放着,窗外的浓荫,绿水般渗透进屋里来。微微的凉风,和着鸟叫、蝉声,都送到我耳中。那时我的神志,稍微地清醒一些,觉得屋里洁净无尘,清静得很。”这在现代人听来神仙一样的好梦,从前不过是旧京人家寻常小憩的剪影,那绿水般的浓荫恰是那梦舟荡漾的源头。

老北京的民居颇重绿植,夏日里遮荫、点景、娱性,妙处虽可意难描。四合院中没有不种些高大树木的。民宅植树以槐树、枣树为主。槐荫掩窗,潺湲便立时减去了。但是很少有松和柳树的。“昔年宿德,但见松柳”,“白杨萧萧”,常见于坟园的树木,是不宜种在阳宅里的。石榴也是四合院常见的树种,一取其“多子”的寓意,二可赏花食果。石榴便于盆栽,保养得好可以长到四五尺高,不过冬天要移入室内,非大屋不能为。

树木之外,花草则是缤纷多姿、因人而异。盆栽少则一二盆,多则数十盆。大盆的品类如金桂、银桂、杜鹃、栀子、夹竹桃、百日红等。鲁迅曾在北京西三条的住所,一处并不宽绰的四合院里,密植了“紫、白丁香各二,碧桃一,花椒、刺梅、榆叶梅各二”。矮盆品种多为水珊瑚、草珊瑚、韭菜莲、八宝儿、野杜鹃等。北方的花卉香气不浓,街头叫卖的多是南方的品种,吆喝道:“卖玉兰花儿来晚香玉,晚香玉来香绒花,指甲草来茉莉花。”也有趣味的儿歌:“好热天儿,搭个凉棚,歪脖子树下,有个姐儿哄着我玩,穿着一件坎肩,梳油头,别玉簪儿,左手拿个小花篮,右手拿着栀子、荔枝、茉莉串儿。”

旧京夏季,高阔门庭与中等人家都会请“蓬匠”用杉篙、芦席在院中“高搭天棚”,遮荫避暑。天棚之下草木繁盛,特别是用大陶缸蓄养的荷花、金鱼,最为清逸可人。京剧鼓王刘保全的经典名段《大西厢》里面红娘请张君瑞一节,把个山西的普救寺唱成了北京的四合院:“穿游廊,过游廊,不多时到西厢。人人都说西厢好,果然优雅非比寻常。清水的门楼影壁前头爬山虎,影壁后头养鱼缸,茨菰水里头长,荷花茂盛半阴半阳,红的是石榴花,白的是玉簪棒,蓝的是翠鸟儿,绿的本是夜来香……”

荷花从端午赏到中秋,半缸松土,几块马掌就能滋生出脱泥不染的清涟君子。林语堂的小说《京华烟云》(译《瞬息京华》)曾写:“这几片荷叶动了,一定有鱼儿游过。漂浮水面的荷叶上面,一个个小水珠大似墨绿苍穹上许许多多翠绿的明月,在荷叶的浓荫下色调更深了。近边漂浮的青苔使绿水泛黄,而碧空倒映在盆中又使水变成了宝蓝色。”荷香袭人,怡红快绿,比之南方湖池胜地,俊雅特异,不让分毫。

书概

读史记

灵公老,急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 理想主义者的困境

孔子是理想主义者,可惜没有人用他,只有鲁定公任用了孔子。孔子当最大的官是鲁国大司寇,相当于司法部长。最辉煌业绩是在与齐国的会晤中,不让表演少数民族歌舞,不让一般百姓听管弦音乐,并为此腰斩了几个戏子。还颁布了“拆城墙”的政令,因为大夫的城墙太高,不合“礼”,结果令行禁止,不了了之。孔子五十六岁那年,任大司寇代理国相职务,杀了大夫少正卯,让后人议论了两千多年。他离开鲁国后周游列国,一度“累累若丧家之狗”,仍无人赏识。

孔子不能为用,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名声太大。名高震主,主何以堪?楚昭王差一点用了孔子,给他的七百里的封地都准备好了。但令尹子西的一番话让他收回了成命。子西的意思是:我们楚国连子贡、子路这样的人都没有,还要给孔子一伙分封土地,当年周文王封地不过百里,结果能一统天下,如果给孔子七百里的封地,对我们楚国不是好事啊。其实还有一层意思没说:孔子来了,我怎么办?君臣都不欢迎,孔子当然是不能为用了。

孔子对自己的评价是“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说这话的时候,他还在列国中周游,还希望自己有所作为,虽然五十多岁了,还说自己还没老。孔子一生想建立一样的王国,却不得一处可以施展抱负,可叹!可叹! 王肖杰

本版投稿

bjcbdsb@sina.com

行役途中的性情中人 纳兰性德 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读《纳兰词》,总忘不了里面那首《寻芳草·萧寺纪梦》。词曰:

客夜怎生过?梦相伴、倚窗吟。薄嗔伴笑道:“若不是恁凄凉,肯来么?”来去苦匆匆,准拟待、晓钟敲破。乍恨人、一灯花堕,却对着、乱红火。

作者客行他乡,寓居古寺,夜间梦见了和妻子的恩爱缠绵。在这个浪漫的梦里,夫妇二人窗前联句,琴瑟相和;妻子一句“薄嗔”,尤其非比寻常。那说的是什么?要不是嫌外面凄凉,你怎肯回家伴我?它表面上似乎是埋怨丈夫,可这“恩怨相尔汝”的儿女情话,内里爱意却至真至深。然而依偎温存之际,灯花坠落,美梦消散;强睁倦眼,惟有佛门青灯寂寂相对;向时乐事,无非虚空。当然,以真幻对照、哀乐相映之法作词,多半是沿着东坡名作《江城子》的路数在走,算不上新鲜。可这一篇小令,情感表达毕竟是细腻的、独到的,不单写活了行役中人对妻子的思念,还透出浮生若梦的凄美感。读者玩味之,恐怕是不难产生共鸣的。

那么,写出如此深婉、缠绵之作的纳兰性德,会是怎样一个人呢?在词人的圈子里,上面这样的作品,似乎非漂泊在外的多情种不能道出。单有真情,却无真实的人生遭际,则情多半找不到

激活的际遇,就会流于“无故寻愁觅恨”。而单有浪迹天涯的经历,却无敏感的精神心灵,则词笔落笔,怕往往要犯空洞、粗豪的毛病。纳兰性德,偏就是一位长年奔波于行役途中的性情中人。

熟悉“红学”的人多半知道,曾有不少老夫子,竟把他当作贾宝玉的原型。如此论断固不无捕风捉影之嫌,然而细究之,也多少是事出有因的。性德乃是康熙朝大权臣明珠之子。他的家庭就像《红楼梦》中的贾府一般,有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而明珠恰恰又是雅好文艺之辈。按《啸亭杂录》的记载,其人“居处无不锦衣玉食,充满庭宇”。这样,成长于斯少年性德,自幼便在妙品名迹中驰骋卧游,同时又衣食丰足、无俗务劳心。他曾对友人梁佩兰说:“仆少知操觚,即爱花间至语,以其言情而入微。”一句话,既道出了他的审美趣尚,也多少暗示了他的性格。而也就是这么一个从贵族家庭中走出的细腻公子,甫一入仕就当上了康熙皇帝的侍卫,而且是由三等侍卫升为一等。这种经历,当然带给了他荣耀。可它终究也带给了这位年轻公子远离亲人、居无定所的生活。看看性德的履历,就能知道,从当上侍卫到英年早夭,短短八岁左右,他几乎时时都在奔忙。康熙巡视京畿、驾幸汤泉、

慰问边塞、祭祀白山、西游五台、南下江浙,每次都有他出警入辟、随驾扈从。尤其是康熙二十一年,他还跟随朗谈远赴黑龙江上游,为的是侦察俄军动向。可以说,作为皇帝的高级跟班,性德一入此道,就再没有了少年时代的潇洒自在、无拘无束,更鲜能得闲与妻儿长相厮守。既然如此,前举感人至深之出自他手,又何足为怪呢?

性德并非没有政治抱负,可三十一岁就撒手人寰,让他没有机会以事功知名。能让他时时有后人所纪念的,惟有那词人的身份而已。《寻芳草·萧寺纪梦》只是遗珍之一。倘若翻开一部《纳兰词》,读者自不难读到足可与之媲美的佳作。他出色的作品,不少与爱情生活有关。除了行役相思成为创作诱因,爱妻卢氏的早逝,尤其刺激他写出二十多首优秀的悼亡词来;这数量在此前词史上无人能及,质量也足以比苏轼、贺铸。当然,他词作里吟咏边塞生活、感叹生命辛酸者,同样每每有佳构。而他作词的典型特征就是兼得凄婉细腻与真挚自然,颇有李后主、晏小山遗风。王国维以“北宋以来,一人而已”许之,或未必中肯,不过若说他至少为明清两代间一流词家,应当是不算过分的。

徐楠(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容若旧居

纳兰性德,字容若,自幼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数岁时即习骑射,17岁入太学读书,18岁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他用两年时间,主持编纂了一部《通志堂经解》,受到皇上的赏识。后来,他又把搜读经史过程中的见闻和学友传记记录整理成文,编成四卷集《渌水亭杂记》,其中包含历史、地理、天文、历算、佛学、音乐、文学、考证等方面的知识,表现出他广博的学识基础和各方面的兴趣爱好。

“不画天使,因为从没见过”

库尔贝 不媚潮流为自由

1855年,法国巴黎万国博览会与一年一度的沙龙画展共同举行,当朝皇帝拿破仑三世兴致勃勃地亲往参观。当他走到一幅名为《浴女》的油画跟前时,眉头有如受了针刺般皱缩起来。画面上的裸体女人毫无高贵和优美可言,形体粗鄙,更像一个乡下人。在拿破仑三世看来,如此高雅的艺术盛会竟然有此不堪入目的败笔,真是有辱斯文、大违不道,忍不住扬起手里的马鞭,狠狠地抽在“浴女”身上抽了一鞭。

这位令皇帝怒不可遏、大加鞭撻的画家是法国19世纪中期现实主义画派的领袖居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 1819-1877)。他一生反对矫虚的创作观念,对远离现实的题材不感兴趣,只忠于“真实的、存在着的东西”。他曾说,“我没办法画天使,因为我从没见过。”他的创作对象有剧场的丑角、猎人的铁锤,一个侧身,都没有清晰的面容,暗示他们从来就是被忽视的一群。画家的灵感完全来自他的亲眼所见,库尔贝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情节发生在烤人的太阳下,在道旁的沟边……这儿丝毫没有什么虚构的东西,我亲爱的朋友!而这个阶级的人们往往就是过这样一生活的。”

库尔贝同情底层的现实主义与标榜高贵的上流阶层的审美取向格格不入,他的作品屡屡被沙龙画展拒之门外。画家索性黝黑的手默默地挥着并不粗壮



库尔贝的《画家在工作》

的铁锤,显得迟滞无力。两人一个背影,一个侧身,都没有清晰的面容,暗示他们从来就是被忽视的一群。画家的灵感完全来自他的亲眼所见,库尔贝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情节发生在烤人的太阳下,在道旁的沟边……这儿丝毫没有什么虚构的东西,我亲爱的朋友!而这个阶级的人们往往就是过这样一生活的。”

办个人作品展览,名为“现实主义,库尔贝,他的四十件作品”。他在展览序言中自道:“现实主义。如果对19世纪30年代的画家们给予浪漫主义的称号,那么我就应该是一名现代主义者。我不仅仅是一名画家,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个人,创造活生生的艺术,这就是我的目标。”

当库尔贝的成就逐渐为世人所重视时,他却丝毫不为所动,“让人们去说我吧,我从不归属任何派别、任何教会、任何机构,尤其是从没归属过任何一种制度,只有自由制度除外。”他坚

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

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首都爆发革命,建立巴黎公社,库尔贝当选艺术委员会主席。他主持捣毁了象征“帝国时代的战争和征服思想”的万多姆广场的拿破仑圆柱。公社失败后他被监禁6个月,并被处罚32万3千法郎。此后库尔贝流亡国外,1877年在瑞士去世。他至死坚守着自己在公社时提出的纲领,“不受政府监督,不享受任何优待,艺术自由发展”。

朱锴(首都博物馆)

三山五园与清代政局·之三

伤逝远超骄傲 历史已成创伤

圆明园 帝国夕阳中的强盛梦幻

圆明园,是清代最著名的皇家园林,也是人类历史上最绚烂的园林。它历经清朝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代一百五十余年皇帝的修缮与经营,见证了大清帝国的繁华与辉煌,也经历了大清帝国的没落与沧桑,是中晚清以来中国历史的缩影。

鼎盛时期的圆明园由圆明、绮春(后改称万春园)、长春三园组成,其中圆明园是其核心,故往往并称“圆明三园”。但实际上,圆明园占地5200余亩,但是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相当于整个紫禁城的建筑面积总和,其中包含的园林数目远不止五个。当西方传教士第一次见到这个人间天堂的时候,惊讶到不知该如何形容它,于是就将之称之为“万园之园”和“东方的凡尔赛宫”,1726年农历新年后,雍正皇帝正式移驾圆明园,并扩建命名了“圆明园二十八景”。此后,他终年在此处理国政,为大清奠定了制度基石。最终雍正卒于这里,在清朝,野史中均传说雍正是被刺身亡;但据可靠的史料记载,雍正

(1709年) 整修后赐予四皇子允禩(即后雍正帝),命名为圆明园。在这里,康熙第一次遇到了自己最为喜欢的孙儿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帝),一些史家认为,正是由于康熙喜爱弘历才决定传位给雍正,以保证弘历继位登基。因此,这次相遇也许决定了大清帝国的未来几十年的命运,而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康乾盛世。雍正帝是否弑父篡位、畏父阴魂无法论定,但是康熙之际发生过继位危机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修建属于自己的圆明园而非沿用康熙的畅春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避开这段政治纷扰,并借以建立雍正自己的正统和权威。

首先,从修建原因来看,圆明园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修筑的。在康熙时,圆明园所在的地方只是一个赏花的“牡丹台”;康熙四十八年

更可能是死于丹药中毒。1738,乾隆在服完三年之丧后,正式驻蹕圆明园。这位壮志凌云的“世界之王”更是将圆明园作为宣扬盛世、彰显繁华的功业,倾国力之力,在圆明园东修建长春园,将圆明园扩建为四十景。乾隆之后的嘉庆、道光帝也屡有修缮,对于他们来说修建圆明园已经成为国富民安的象征,尽管事实上帝国已经是日渐没落的夕阳了。

其次,从功能上来看,圆明园是清代政治决策、制度运作和内政外交的核心区。南起大宫门、北至九州清宴殿的外朝内寝是清代政治运作的枢纽,大宫门内的朝房设有六部、军机处等纪要部门,是皇帝驻跸时中央决策和发布政令之所。贤良门内的正大光明殿是皇帝听政理朝、会见臣僚使节的地方。

圆明园不仅是清代皇帝接待属国和番邦使节的地方,也是中西方政治文化碰撞和交融的基地。西方传教士如宫廷画师荷兰人郎世宁、法国神甫王致诚等曾经见证圆明园的辉煌,

还参与了长春园中西洋楼区的设计和监造。可以想象,1760年,当由西方人设计、由中国最伟大的建筑师样式雷家族修建的西洋楼完工的那一刻,东方和西方的文明在圆明园擦出了人类文明史上最绚烂的火花。

其次,从结构和形态上来看,圆明园是清代疆域法统和文化政统的象征。圆明园的景点大都具有丰富的政治和文化内涵;比如九州清宴象征大清王朝对中国的主宰,因为九州就是中国疆域、领土和文化正统的象征,拥有九州就意味着政权的法统地位。蓬岛瑶台就源自中国神话,又象征中国东方。这层层累积的政治和文化内涵构建起了大清帝国天朝上国的政治和文化隐喻,让身处东方儒家文化圈的人产生一种无所不在的敬畏,从而从内心深处臣服于它,这正是圆明园在清朝政治乃至整个东亚政治和文化史上的意义所在。

如今的圆明园,已经是一片废墟;而如今玩味的是,只有西方人设计修造的西洋式建筑依然在废墟中矗立。中国人从圆明园中感受到的伤逝要远远超过骄傲和自豪,圆明园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永恒的创伤。 席会东(北京大学历史系)

悬疑

名门之后屡立功 求助满清其心谁明

吴三桂降清多争议



吴三桂为辽东人民,祖籍高邮,字长白,其父吴襄为锦州总兵。

吴三桂在十六七岁时就应试武功并得武举,《庭闻录》里说他“自少为边将”。他的教生陈邦选也说他“少年慧印”。史书说吴三桂勤于读书习武,“终日无惰容”。他年少读《汉书》,被“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这两句话深深打动。崇祯五年(1632年),年仅20岁的吴三桂任游击将军,虽然这与其家庭背景密切相关,但不可否认,他的非凡资质也是年少得志的重要原因。

吴三桂长期参与着对清作战。崇祯十二年(1639年),27岁的吴三桂被任命为宁远团练总兵,并有较为出色的实战业绩,“忠可炙日,每逢大敌,身先士卒,绞杀虏级独多”。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崇祯于煤山自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在一片石战役中击溃李自成,随后,因镇压农民起义和执掌南明桂王有功,被清朝封为平西王,管理云南贵州地区。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议撤藩,吴三桂联合尚之信、耿精忠,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起兵反清,史称三藩之乱。其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在湖南衡阳称帝,国号为周。同年在长沙病逝。孙吴世藩继位,势力日衰。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军攻陷昆明,“三藩之乱”平定。

虽说在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作战时向满清求援乃事实,但吴三桂是否降清,则颇多争议。

认为吴三桂投降清朝无疑的观点有二。一是清朝最高统治者视吴三桂为降将,如清摄政王多尔袞就把吴三桂作为部下驱使,“命三桂兵各自布系肩为号”,“命三桂军先锋”,又“命吴三桂以步骑二万前驱追贼”。其后剔除吴三桂爵位时,并有如下用语:“逆贼吴三桂穷蹙未归,我世祖章皇帝念其输未投降,授之军旅。”(《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如此看来,吴三桂投降无疑。其次,吴三桂此后不但拒绝南明政权福王的多次反清复明倡议,更于之后出兵缅甸追杀南明永历王,这几乎是吴三桂背叛明廷的铁证。

持相反观点者则认为,以吴三桂过往抗清强硬态度而言,其联合清朝对抗李自成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但这不能证明投降事实,且多尔袞在山海关战后加强了对吴三桂的控制,这可以理解成对降将的不信任,但也可以理解成恰恰因吴三桂未降,多尔袞才予以拉拢控制。而且,在山海关战后,吴三桂曾发布檄文,其中有“周未改,汉德可思”,“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他家之正统”等语句,证明吴三桂仍未降清。而随后攻陷北京,吴三桂欲立朱明太子,这也是其未降的证据,只是因多尔袞命其西行追贼,方打乱了吴三桂的谋划而已。 欧洋/编

